

胡宏知言哲學研究

張琴著

胡子知言卷第一

天命

胡子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
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

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說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
心之樂也難是故仁智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
之進退

上選於庠塾政令行乎世臣學校起於鄉行財出於九

胡子知言卷第一

廣雅堂叢書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學出版社

胡宏「知言」哲學研究

张
琴
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宏“知言”哲学研究/张琴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7-308-17706-1

I. ①胡… II. ①张… III. ①胡宏(1106—1162)—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44. 9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4524 号

胡宏“知言”哲学研究

张 琴 著

封面题签	董 平
责任编辑	张小苹
责任校对	宋旭华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隆盛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55 千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706-1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本书为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基金重点项目
(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基地项目)
项目编号: 12JDSX022J

序

董 平

11 世纪中叶发皇于北宋的“新儒学”运动，实有其时代之政治与文化的内在原因。就思想之历史运动的内在逻辑而言，佛学自 1 世纪从印度输入，至 6 世纪末而实现其“中国化”的基本建构，也即脱离其印度文化母体而在中国这一新文化母体之中实现其重新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则以智者大师之天台宗的创立为基本标志。天台宗体大思精，观行体系完备，实为此后中国佛学之主流形态奠定规模。7 世纪之后，佛学尽管已经实现其“中国化”，但究其来源，仍为外来，其观念体系、价值取向、理论形态、实践方式等等，仍与以儒学为核心形态的中国文化存有内在冲突。慧能之后，禅学风行，遍及南北；韩愈首揭“道统”，意在重新追回孔孟之道，使中国回归其之所以为中国的文化本质。然风气所向，虽以昌黎公之崇高地位，终究无力以挽狂澜；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之说，止于外在之破斥，终为皮相。及至 11 世纪中叶，“北宋五子”挺立于世，皆深究佛家诸说，而终返诸六经，探赜幽微，达本穷源，始止佛学之泛滥，而归孔孟之本源。故就中国思想之历史运动的实迹而论，7 世纪以降，佛学之强势繁荣反而促成了中国文化之本根意识的醒觉，“道统”的回归则代表着中国文化之“主体性”的自觉挺立与重建，而理学或道学至 11 世纪以降的渐趋隆盛，则既以佛学的解构为根本的思想目的，复以儒学的本原性重建为基本面貌。然亦正以理学或道学是以解构佛学为基本目的的，所以佛学在其中也一直扮演着“有意义的他者”的角色。

至于 12 世纪中叶，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同时崛起于东南，皆学殖深厚，而乘时代之风云际会，各以其思想之主旨而为北宋以来之理学运动继往开来。我早就指出，至南宋乾道、淳熙之间，北宋以来的理学一哲学运动最终达成了三种基本的思想形态：一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二是以陆九渊为

代表的“心学”；三是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历史哲学”。^①“理学”以周敦颐为之“开山”，经二程（尤其是小程子颐）为之光大，而至朱熹为之集成；“心学”实由张载为之浚源，而至陆九渊成其规模；至于“历史哲学”，则以中国传统史学为学术形式，又以道的追寻为史学目的，实现了史学与哲学之融合。此三种不同的思想形态，各有其长，皆为理学或道学运动所实现出来的思想成果，皆体现关于道的观念及其存在方式的不同领悟，代表了对于道之追寻的不同途径，是则三家之学，虽业不同而功同，正所谓“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也。

在理学发生与发展的这一过程之中，尤其是“心学”形态的建构过程中，以胡宏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之说，实最富内涵，其思想洞见，往往卓异于时。胡宏承其家学，既学问富赡，而又精于思辨。其《皇王大纪》之著，非但可占其经世之学，而道统之义，已蕴于其中；其《知言》之著，虽篇幅未见其浩繁，语言未见其简奥，然有所论列，则条理分明，陈义透辟，堪为理学著作之翘楚。其观点之特达，如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义完具。无适无莫，不可以善恶辨，不可以是非分。无过也，无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显而易见，胡宏已为发明“性无善恶”之义，甚与当时流行之说不相协和。故《知言》既出，朱熹为之不安，尝著《知言疑义》，力加排斥。《知言》中的一些特出之见，“所谓‘性无善恶’，‘心以成性’，‘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指名其体曰性，指名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云云，朱子力诋其非，至作《知言疑义》，与吕祖谦及宏门人张栻互相论辩，即栻亦不敢尽以其师说为然。”^②既经朱子之“力诋其非”，则胡宏之说为不显；既“栻亦不敢尽以其师说为然”，则张栻终未能得其师之思想精髓。“湖湘学派”之不长其传，岂不良有以也。

然胡宏之说，却曾受到浙东学派诸子的响应。胡宏有言曰：“事有大变，时有大宜。通其变，然后可为也；务其宜，然后有功也。”陈亮尝专论“勉强行道大有功”，虽发明仲舒之义，而实与胡宏之说相表里。故陈亮尝撰《胡仁仲遗文序》，以为胡宏之说，“辨析精微，力扶正道，惓惓斯世，如有隐忧”，力为表彰。则胡宏之说，与浙东学派实有思想上的内在关联。仅从师承关系而言，朱熹、张栻、吕祖谦亦皆与胡安国有关。《宋元学案·武夷学案》曰：“南

① 可参拙著：《宋明儒学与浙东学派》中的有关论文，贵阳：孔学堂书局，2015年，以及《王阳明的生活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② 《四库全书总目》“知言”提要。

渡昌明洛学之功，文定（胡安国）几牟于龟山（杨时），盖晦翁、南轩、东莱皆其再传也。”胡安国从子胡宪（字原仲）从胡安国学，又尝为朱熹与吕祖谦之师，张栻则为胡宏弟子，故全祖望谓朱、张、吕皆为胡安国之再传。吾业师潘富恩先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即关注到湖湘学派与浙东学派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在事功思想与理学义理上均有许多共通之处，二者的联系应当受到学者们的重新关注。

张琴博士的这部《胡宏“知言”哲学研究》，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她于2007年考入浙江大学攻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学位，2010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又师从束景南教授，在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张琴博士为学勤勉，善于独立思考，所发议论，不人云亦云，而必有所据。书中将胡宏之学置于宋代独特的政治—文化语境之中详加考索，并由此而展开“知言”学术主旨及其理论体系之建构的阐述，使胡宏之学获得了纵深的历史维度与厚重的现实维度。其撰写博士论文时，我曾提出希望她将湖湘学派与浙东学派在传承与义理上进行深入研究的建议，虽当时未能付诸实施，但在修订中，则专辟一章，就胡宏与朱熹、张栻、吕祖谦的思想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内容涉及本体论、“理欲同体”问题、心性论等等，虽未专论湖湘与浙东，然有关问题已有论列，则其好学深思，学之不已，不自满足的为学态度，岂不难能可贵！众所周知，理学概念繁多，内涵非一，概念间的意义关联，为之辨析毫厘，尤为繁琐而艰深，然本书之所论，非但不避艰深，且就胡宏学术体系之建构，为之分门别类，为之条分缕析，为之逻辑梳理，为之圆融阐释，向读者呈现了完整的“知言”哲学体系，非明敏颖悟而长于思考者，谅不能至于此也。

今张琴博士此书即将付梓，嘱予为序。余喜见其学之有成也，遂撰数言弁于卷端，权以为序。

2017年11月16日

于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两宋之交的时代与文化	008
第一节 辟佛与“道统”的树立	008
第二节 文化危机与宋学兴起	014
第三节 荆公新学与正统之争	019
第二章 “知言”思想的涵义与宗旨	028
第一节 胡宏生平与“五子”道统	028
第二节 “知言”涵义与理学诠释	035
第三节 “知言”哲学的宗旨与使命	041
第三章 胡宏的学术传承与家学渊源	050
第一节 道南学派与湖湘学派	050
第二节 胡安国“传心”之学	060
第四章 胡宏“知言”哲学的建构	078
第一节 性一分殊的性本论	079
第二节 性命合一的人性论	102
第三节 至善的大本之性	107
第四节 “同体异用”之理欲观	122
第五节 “性体心用”的心性论	137
第六节 中和问题的探讨	151
第七节 “尽心成性”的工夫路径	160
第八节 察识涵养的实践方法	166

第五章 胡宏与东南三贤的思想交集 178

 第一节 朱熹对《知言》的反思与批评 178

 第二节 吕祖谦对《知言》的重新评审 186

 第三节 张栻对“知言”思想的质疑与发展 197

参考文献 217

关键词索引 221

后 记 224

绪 论

陈寅恪先生曾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一文中断言：“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①在当代的文化环境中，无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勃兴是否会以新宋学的面目与姿态复归，但可以肯定的是华夏文化振兴之主要内容必然涵括对于宋学的研究与诠释，特别是对于宋代理学的核心思想以及方法论、思想史进行深入的梳理与探讨。因宋代学术之大成就体现于宋代新儒学或理学的建构，理学为古典儒学之重光。宋代理学的使命则是在外来宗教与文化的挑战下，以回归先秦古典儒学之“下学上达”而认知天道的精神为第一要务，借鉴佛教哲学、道家思想以及其他学派的长处，重建与树立儒学的基本骨架，补充与丰满各儒学范畴的主要内涵，厘清并区分各儒学范畴间的逻辑关系与次序，将宇宙论、心性论、人生论、价值论、政治论有体系地加以整合，使得这一发源于西周的思想巨人重新站立于历史长河，成为真正的中流砥柱，支撑起人间之伦理价值体系与政治制度秩序。理学的建构方式与内容对于现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华夏文化之重构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宋代理学对古典儒学的致敬与回归是全方位的。为学目的与人生使命

^①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邓广铭全集》（第九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26页。

回归于“学以为己”的学问路径与优入圣域的生命归宿；制度建立与政治目的则复归于人人自我管理的大同礼乐盛世。这一种回归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种种内因外缘的冲击、磨砺下的重建，从某种意义上说，理学从兴起、发展至于完成，其过程不异于一场脱胎换骨式的革命运动。南宋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胡宏正生活于此波澜壮阔的文化重构与政治革新的历史演进之漩涡中。其学术思想承上启下，文章风格大开大阖，行文逻辑条理严密，开出一派新学问；其为人温恭有蕴藉，嶙峋又洒脱，务本且求实，树立了一代儒家新君子风貌。

宋代新儒学思想体系建构的完成时期，大约是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间（12世纪中后期）。在此期间，学派的发展渐趋稳定与成熟，基本形成了四种形态的思想成果，其代表人物也被后人赞称为“乾淳诸老”。

其一是以胡宏为代表的湖湘学派。胡宏主张“性一分殊”，关注对于性作为宇宙最高本体与人的生命本质、道德本质之同一性的诠释，同时提出“性体心用”的观点。本体的最高者——性体遍在于一切人、事、物，就其主宰与灵动作用而言，称名为心；就其流行与作用于一切事物，称名曰理。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中，人只有“尽心成性”，通过自我本心苗裔之省察发见而扩充圆满，才能返归宇宙大本之性，成为物我浑然一体而正名为“人”。与“性即理”的理学范畴之逻辑关系与次序不同，胡宏坚持“理即性”的观点。他强调“性气一体”的宇宙论建构方式，因形而上之性与形而下之气在现实世界中的相即而不离，胡宏主张“理欲同体而异用”。人欲的节制就是大本之性与天理的体现，而人欲的泛滥则是大本之性与本心的遮蔽，二者“同行而异情”，此所谓天理从人欲中看出。胡宏强调道德践履必须着实，从生活中时时刻刻磨炼意志，发明本心，而非脱离现实社会生活而谈论不食人间烟火的缥缈天理。而这与朱熹基于“理气不杂”观点的宇宙论而衍生的理欲截然为二的观点迥然不同。

其二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朱熹发展完善了程颢、程颐的理学思想，重新诠释了“理一分殊”与“性即理”的理学命题。他强调天理的先天性、权威性与独立性，注重天理内化而为人之道德本质的理论建构，将因形而下之气所产生的人欲、人心与由形而上之道所赋予的天理、道心严格对立。在经验世界中，人只有时刻警惕与防范人欲的泛滥以及人心的危殆，才有可能在生命过程中真正体认天理，返归道心。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因理一分殊，所以事事物物皆秉承天理所分殊之事理，我们必须在与人、事物的对待与处理中不断地摸索探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通过不懈之努力，终将实现天理

的体认而优入圣域。

其三是以陆九渊为代表的象山学。陆九渊后来居上,直承孟子“尽心”说,主张“心即理”,强调先天人性之至善与光明,指明心不是一个缥缈隐约的“虚心”,而原本就是具备直接超越性而与宇宙同源、同体、同明、同一的“实心”。他反对如朱熹般支离地看待道心与人心,认为二者本源则一。在象山看来,修身问学的大道就是直接发明本心,从而顿悟彻达宇宙真理。他注重树立本心与人性之先验至善价值,认为先验之至善心体一经接触事物,就具有在经验世界中表达自身本质的必然性,这就是仁之四端。当我们扩充源于心体之仁义端苗而至于心之全体,则心与天理同源归一,人才能成就那个大写的人。

其四是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婺学又称“吕学”、“金华学派”,是浙东学派的重要一支。吕祖谦上本历史文献学的家学渊源,兼容并蓄,吸取胡宏、朱熹、陆九渊等人的理学精粹。他主张“心即天”,认为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就是天道作用于人世的体现,历史正是人事在天道作用下的演进与表现。吕祖谦“心即天”的历史哲学涵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天道普遍贯彻于表达于自然、社会与人等一切现象。一切人事的变更与朝代更迭、自然现象的沧海桑田、生灭变迁,都是天道之流行与呈现。由此,人必须了解历史人物与事件,切身体会历史,从历史的演变进程观照天道,认识天道,从而顺应天道,将天道规律付诸社会生活实践,从而推进历史。另一方面,历史也是人的主体性活动的呈现。“主宰者谓之心。”人只有实现自我本心的回归,才能成为自体生命的主导者,才能真正进入历史,参与历史,创造历史。

基于不同的思想维度,各学派之精英学者对儒学的宇宙论、人生论、工夫论、价值论、历史观以及政治观等方方面面进行了整体性思考,历经几代学人的努力,最终完成各具理论特色的四种理学形态。在南宋时期,这四种学派都曾经发生深刻的文化影响,彼此间既有借鉴与吸收,也有质疑与批评。由于种种原因,其间三大学派逐渐衰微,至于元明时期,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逐渐成为学术与官方的主流学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形态。如果以晚唐五代比之欧洲的中世纪,那么宋代的“新儒学复兴”可比为欧洲的“文艺复兴”,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个全盛的文明巅峰。至于明朝中叶,阳明学崛起,才接续象山学之心传,打破朱熹理学在几百年间因固守成说而无思想开新的僵化局面,理学运动又攀上一个新的巅峰,而似南宋乾道、淳熙年间理学运动之学术高潮以及书院讲论之盛况,则无法重现了。

二

在近现代以来的学术研究中,对于胡宏的关注并不少见。牟宗三先生的著作《心体与性体》认为:承周敦颐、张载、程颢而来的五峰一系本于《论语》、《孟子》之心性论,兼且融合《中庸》、《易传》之天道思想,正是“以心著性”之“圆整饱满”的儒家正统派系。而朱熹理学一派则“别子为宗”。牟宗三的观点虽未受到广泛赞同,但其分系方式作为以界定“心”、“理”、“气”为宇宙本体并依此划分理学体系的传统分系方式之补充,其学术价值不可低估。由于牟宗三先生的学术影响,湖湘学派与胡宏也受到海内外更多学者的关注。

当代学者劳思光先生在其著作《新编中国哲学史》中对胡宏思想做了阐释。他将胡宏作为朱熹论敌之一,围绕着《中庸》之中和问题,以《知言疑义》为主要文献来源比较了胡、朱思想的渊源与差异。劳思光先生不赞同仅以本体论为标准而划分理学体系的分系方式,他认为哲学史的研究应该以各个思想家对于“基源问题”(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为标准来进行区分。劳思光先生的治学宗旨以回复孔孟之学的“心性论中心之哲学”的道统为标准,把宋明理学学派划分为天道观、本性观、心性论三种类型。他认为只有陆王心学一派才是承接孔孟心性思想的道统一派,而周敦颐、张载、程颢、胡宏都被划归为天道观一系。综合言之,劳思光先生对于胡宏性论的理解为“只存有不活动”之性体,这与牟宗三先生视野下的胡宏之道体与性体、心体为“既存即活动”的意见十分不同。

另外,不同于以上两位新儒家学者,侯外庐先生在《宋明理学史》中以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评价胡宏的心性论,认为胡宏论性理关系为“性一理殊”,朱熹为“理一性殊”。其中不乏精彩之处。唐君毅先生在《中国哲学原论·原性论》一书中对胡宏的“识心”思想作了解说,认为胡宏之识心说“为象山言发明本心之先河”。20世纪50年代,王开府先生的著作《胡五峰的心学》,以胡宏心性论思想的阐述为重点,是胡宏思想专题研究的第一本专著。20世纪90年代,王立新教授的《胡宏》一书,对胡安国、胡宏的生平事迹以及年代均作了详细的考证,并围绕胡宏性论对胡宏理学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向世陵教授的《善恶之上——胡宏·性学·理学》专注于胡宏性理思想的研究。

究,其新著《理气心性之间——宋明理学的分系与四系》把宋明理学分为性学、心学、理学、气学四系,凸显了胡宏性学在宋明理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朱汉民教授著有湘学专论——《湘学原道录》。方克立、陈代湘教授主编的《湘学史》历述湖湘学发展的过程及其与其他学派交互融合的历史源流,详尽地展示了湖湘学从开创至于今的发展历程。林庆彰先生主编的《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辑刊》中收录了台湾学者苏子敬《胡宏〈知言〉哲学课题之研究——以“内圣外王”概念展开之》、陈祺助《胡五峰之心性论研究》、王俊彦《胡五峰理学思想之研究》三种著作。另,复旦大学的曾亦教授、台湾大学的杜保瑞教授对于胡宏哲学思想均有相当的研究。对胡宏思想有相关研究的还有:方国根、赵载光、肖永明等。南昌大学的杨柱才教授于2005年在《中国哲学史》上发表论文,对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胡宏集》标点遗误做出了修正。200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胡宏集》参考并采纳了杨柱才教授的大部分见解,在旧版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善与修订。2015年,赵载光教授著《湖湘学统与宋明新儒学》,从思想流派发展的角度分析了湖湘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学术流派的关系,将湖湘学派归为从周敦颐到胡宏的“诚学”一系。

目前,在胡宏理学之溯源与诠释、理学范畴关系之互摄与分析等方面,仍存有较大的理论阐释空间。对胡宏之父胡安国与胡宏的学术传承关系、湖湘学派与谢良佐、杨时的学术渊源,胡宏与张栻、朱熹、吕祖谦以及浙东学派之间的学术传承与思想交集等方面尚有待事例之考证与阐释。对于湖湘学派的时代学术背景与其特有的学术建构取径的考察也仍有待研究之推进。

我们试图诠释胡宏以“知言”为主旨的哲学思想,清晰其哲学体系建构的逻辑次序,追溯胡宏思想的发源,希冀有助于深入理解湖湘学派的学术精神,描摹两宋之际理学运动的丰富形态;通过对胡宏与两宋之际的理学精英者(如张栻、吕祖谦、朱熹等人)的思想传承与交集的线索梳理,试图动态地展现湖湘学派的发展历程与思想形貌,此对于弘扬两湖区域文化与发扬湖湘实学精神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

《孟子》:“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为更准确地

把握胡宏的理学精神,需要增进对胡宏生活之时代环境的了解。我们推进视野,切入两宋时代背景与文化环境之分析,将佛教与新学作为宋代理学崛起之两种主要学术论敌来进行探索与讨论,期以更好地凸显胡宏学术特点;开展对胡安国、谢良佐与胡宏之思想联系的梳理,对张栻、吕祖谦、朱熹与胡宏之思想异同的比较,从横向与纵向的角度梳理北宋相关理学家们以及南宋同时代之精英学者们与胡宏的学术传承与思想交集之关系,期以展现以胡宏为核心的湖湘学派思想发展流变的动态历程。

如张栻所概括胡宏之学的特征曰:

析太极精微之蕴,穷皇王制作之端,综事理于一原,贯古今于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见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发无声无臭之妙,使学者验端倪之不远,而造高深之无极,体用该贯,可举而行。^①

“综事理于一原”,指出胡宏论性具万理而万理同归于一性之大本的理念;“贯古今于一息”,指明胡宏注重省察历史变迁之过程,以史为镜,通过“察人事”而明天理;“即形而下者而发无声无臭之妙”,意指胡宏强调人伦日用与社会生活的道德践履,主张在生活实践中体认与开显形而上“性与天道”之本体。“体用该贯”,赞扬胡宏理学体系完备,有体有用,学习者可以由下至上拾阶直入“高深之无极”的天道。

取孔子“不知言无以知人”与孟子“知言养气”思想作为主旨,胡宏以“知言”为其著作名称,宣告自己批判佛教与新学“异端”与弘扬儒学“道统”之决心,同时也表现了高度的学术自信。《知言》^②一书体现了胡宏理学的主要精神,因此我们以“知言”作为胡宏哲学体系的关键词。

胡宏“知言”哲学体系的建构遵循着由大本之性为宇宙之始终的严密逻辑次序,阐述了性一分殊、性气不离、性体心用、尽心成性、理欲同体等独具

① (宋)张栻:《胡子知言序》,《胡宏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38页。

② 本书所引胡宏《知言》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库本为原《永乐大典》所载,属宋槧原本,其文字未分卷,也未加标题,更接近原始文本内容。其个别字句与200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胡宏集》所录《知言》有区别。文中有引用到两种文本间有出入的文字时,均加以说明。据《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所载《胡子知言》一卷,可知早期《知言》不分卷且无各卷标题,现《胡宏集》中的《知言》为清道光三十年(1850)粤雅堂重刻本,此刻本已分卷并有标题,应为后人添加。侯外庐《宋明理学史》也以四库本《知言》作参考版本,相关观点参见于《宋明理学史》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1页。

特色的理学思想,其以性为归一,以心为主体的“圆顿”心性论与宇宙论贯穿整个“知言”哲学体系。围绕以上核心理学命题,胡宏展开了涵盖宇宙论、人性论与实践论的一系列理论建构。

心、性、道、天命、太极、理的概念,在胡宏思想中都曾用于对最高宇宙本体范畴的指代,这些不同的理学范畴往往用以指代“性”本体在不同理学意义下的不同名称。胡宏试图继承孔孟阐述“性与天道”的奥义,注重心、气、性等理学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梳理。胡宏虽于“性”着墨颇多,但其主要思想仍关注于“心”与“仁”的意义诠释。胡宏论证宇宙本体与道德本体、生命本体同一于大本之性,接着将性这一宇宙本体引入人类社会公共领域,赋予人以最崇高的使命与地位。用西方哲学的语言来说,胡宏是一位人本主义思想家。

胡宏在继承先儒学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发展。刘建麓先生说:“胡宏是最早对程朱理学的某些观点表示异议的开风气人物。”^①刘述先先生也认为“五峰自成一系”,为“独具只眼”。^②可以说,正是由于胡宏之“开风气”,至于南宋乾淳年间,各学派纷呈鼎立,讲学之风盛况空前。胡宏所创立的湖湘学说经由士子的传播而深入人心,成就了一方地域之独特文化风采。

① 《中国儒学词典》“胡宏”词条,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② 刘述先:《宋明儒学之特质与现代意义》,《哲学年刊》第3期,台北:台湾大学哲学学会。

第一章 两宋之交的时代与文化

第一节 辟佛与“道统”的树立

一个时代的学术运动之发轫与勃兴,既需要若干富有创造力与感染力之思想家的推动,也必然有其特殊且深刻的历史背景与文化肇因。钱穆先生讲述中国历史的变迁,曾谈道:“唐末五代结束了中世,宋开创了近代。……我们若要明白近代的中国,先须明白宋。”^①而要厘清宋代文化运动的脉络,讲明宋代的人物,则又要先探讨隋唐与宋代始建之初的时代问题与文化特征。

宋之前的隋唐,是佛学的昌盛繁荣期。佛教自魏晋时期以来,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发展,信徒逐渐由贵族阶层与士族向民间广为流传。佛教的民间化过程同时伴随着各大宗派的集结与发展。东晋时期,南方慧远僧团与北方鸠摩罗什僧团是彼时颇具影响力的佛学文化中心,这一时期修习佛教的大多仍旧是士族与贵族。慧远大师在庐山创立白莲社,汇聚了陶渊明、陆修静、鲍照等一众文化名流,倡导禅观念佛的净土法门。慧远大师对入社要求极为严苛,仅集结一百二十三名各界精英,可见此时的佛教受众仍局限于最上层的文化精英。而经由南北朝的发展,佛教逐渐扩大了影响。杜牧《江南春》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只是概说,据清代《南朝寺考·序》探赅:“梁世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而都下(南京)乃有七百余寺。”^②六朝时期,佛教经过传播在贵族阶层已影响广泛。北魏太武帝灭佛与北周武帝废佛事件在短期内阻碍了佛教的扩张与发展,佛教却也因这些劫难得以整饬与改善,逐渐摆脱了初入中原时对本土道家、方术、习俗的依附,逐渐趋向学术宗派化的发展

① 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页。

② (清)刘世珩:《南朝寺考》,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年,第89页。